

· 专 论 ·

高考“替人受过”现象及其本质

郑若玲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随着高考弊端的越发显现,引发的争议也越发激烈。许多人除诟病高考自身弊端外,还情绪化地将诸多与高考无关的教育和社会弊端也“追根溯源”到其处,高考因此承受着不公正对待。高考之所以“替人受过”,乃因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重大的社会影响,并因此备受关注。而高考受关注的背后,则折射出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影响,以及复杂的社会矛盾。

关键词 高考;替人受过;社会竞争

中图分类号 G642.4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59(2009)02-0022-04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a Scapegoat: Phenomenon and Its Essence

ZHENG Ruo-ling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 As the abuses of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 more and more furious debates are arising in China. Many people castigate these abuses, and some even go so far as to impute many educational and social abuses to the examination. The reason fo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eing unfairly "scapegoated" lies in the fact that with its important social functions and great social influence, it becomes a focus of attention. The attention reflects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act, as well as complicated social contradictions.

Key word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apegoat"; Social competition.

在当今中国教育领域,如果说有什么能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占领各种媒体充斥各个版面、触动千家万户敏感神经的话题,非高考莫属。高考从表面上看只是进入高等院校的“敲门砖”,但因其直接关乎考生的前途命运而备显重要。不仅如此,高考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影响。事实上,高考自建制伊始便一直为社会所关注,近年来随着高考规模的迅速增长,社会影响愈来愈大,加之已实行 50 余年,其弊端越来越显现,引发的争议也愈发激烈。许多人除诟病高考自身弊端外,还情绪化地将诸多与高考无关的教育和社会弊端也“追根溯源”到其处,高考因此承受着不公正对待。高考备受关注的背后,有着深厚而复杂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渊源。只有深入探析高考“替人受过”的现象及其本质,才可能更全面、更理性地认识与评价高考。

一、“替人受过”之种种

回眸高考 50 多年的历程,清晰可见其蜿蜒曲折之路。作为一个社会聚焦点,高考不仅与教育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与政治和社会问题也间接相关,且各种问题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是故,当种种教育、政治或社会问题凸显而无法解决时,人们往往将矛头指向高考。以下仅列数端便可见一斑。

近十余年来,高考与教育的关系被批评最多的莫过于高考对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影响。许多人认为高考的弊端造成了应试教育,“应试”源于“片面追求升学率”(即所谓的“片追”),而“片追”最主要的攀比追逐对象便是高考的升学率,高考因此被看成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从人们对应试教育的界定便可看出二者被明显“捆绑”在一起:应试教育是“在我国基

基础教育阶段实际存在的以提高升学率为目的、围绕‘应考’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1]“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2]

还有不少人认为,“片追”作为对高考教育评价功能的一种反应,给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制造应试教育,阻碍素质教育,并造成中小学“轰轰烈烈开展素质教育,扎扎实实进行应试教育”的奇怪现象。在对“应试”的声讨中,人们最终总是将源头追寻到高考身上,而且中小学教育中其他的“应试行为”也多半由高考的激烈竞争所致。许多人因此将高考看成是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认为不废除高考就难以推行素质教育。

如果说高考对教育确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招致非议与责难不足为奇,那么在“文革”前以及“文革”期间高考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最终被送上政治运动的祭坛,则实在是一种无谓的“替人受过”。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高考早在“文革”前便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随政治运动的跌宕起伏而经历了数次反复与波动,不过总体上还是在不断改革中平稳运行着。但到了1966年5月,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开始,高考不幸被这场可怕的政治运动选为文化教育领域革命的“突破口”而遭废止。

众所周知,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和“坚持不懈地抓阶级斗争”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主要教育和政治路线。自新中国成立初确立“教育为工农服务”方针开始,国家就一直强调各级教育尤其是高等学校中工农成分学生所占比例。体现在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上,便是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产业工人、革命干部等实行优先录取或免试入学原则,并以此作为判断是否“贯彻阶级路线”的重要标准。鉴于1958年对部分工农成分者实行免试入学导致当年新生质量严重下降的教训,1959年的高考停止了对工农及工农干部免试保送上大学的办法,1962年又取消了对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复转军人、参加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干部们实行优先录取的办法,要求他们与其他考生一样参加考试。此外,对以往政审中主要看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审查标准也作了修订,强调主要看本人表现,家庭出身不应作为决定因素。这些措施的落实,使1962年新生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但工农家庭出身的比例则略有降低。

然而,1962年以后,国内的阶级斗争呈现出扩大化和绝对化趋势。学生中工农成分比例下降与这一政治趋势是不相称的,因此招致了凌厉攻击。1964年,高考急剧“左倾”,其核心是贬低考试来“突出政治”,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政治审查工作”。录取采取考

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并恢复了对工农成分考生的优先录取原则。这种“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到1966年达到巅峰。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指出对招生考试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废除现行统一高考,并提出推荐选拔的新办法。统一高考制度就这样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把可怕的政治利斧砍向文化教育阵地的“刃口”,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遭到彻底“革命”。令人欣慰的是,1977年高考的命运又紧随政治遽变而颇具戏剧性,被选为社会实现由乱而治的“突破口”。^[3]

当然,高考在“文革”那疯狂的年代所遭遇的厄运有其历史特殊性,在政清民和的当今中国不可能重演。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民众就能全然理性地看待它。相反,在两极分化与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现实情境下,一些社会矛盾或问题的根源也往往被直指高考,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便是因“失衡的高考分数线”和“高考移民”等问题而引发对高考的谴责。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高考竞争的加剧以及各省市间高考录取率差距的加大,高考录取分数线越来越向某些省区尤其是京、津、沪等几个主要城市倾斜。高考分数线的倾斜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高考移民”问题也由底层非议发展为高层争论,几乎每年全国“两会”都会提及这一话题。2001年,因山东青岛考生状告教育部的倾斜政策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一事件,高考分数线的倾斜问题更是一度引发媒体的“狂轰滥炸”,足见这一问题的社会影响之大。尽管各省市分数线的倾斜是一个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就业以及高等教育布局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复杂问题,绝非划定全国统一的分数线所能轻易解决,也尽管我国实行定额分省录取制度有其合理性,^[4]但对这一问题未作深思的人们还是简单地把板子打到高考身上——高考确实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诱因媒介。

高考分数线的倾斜还造成“高考移民”现象加剧,2008年甚至出现有组织的跨地区高考移民与作弊,从而带来公平、秩序、腐败等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除了社会舆论对高考移民的各种行径进行谴责外,处于“高考洼地”的省区还纷纷出台措施,对“高考移民”进行封堵。殊不知,这种封堵固然保障了当地的考生的权益,但同时却剥夺了移民考生参加高考的权利。这种措施对当地考生来说可能是公平的,但对移民考生来说却未必公平。^[5]

不仅如此,高考还常常成为一些与自身几乎无关系的教育或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例如,认为近年来高校学费猛涨导致贫寒子弟上不起学是高考的错,高

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所带来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是高考的错,甚至连城乡或地区之间教育或社会资源分布不均所带来社会资源拥有量上的“马太效应”也是高考的错。高考犹如被放置在高倍显微镜下,任何微小的瑕疵都可能被放大若干倍,甚至周围社会的污点,也被位移到高考身上,高考因此招致了激烈的社会批评。

二、“替人受过”之背后

高考之所以“替人受过”,乃因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重大的社会影响,并因此备受关注。而高考受关注的背后,则折射出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影响,以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任何一项制度一样,当有限的高考社会功能被无限放大后,必将导致高考影像的失真,以及对高考功能的过分苛求。

作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项教育考试制度,高考在担负起高校选拔合格新生这一本原任务的同时,还“身兼数职”,具有教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项社会功能。从教育上看,高考已成为一根强势“指挥棒”,牵制着教育目的,引导着教育过程,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皆以高考为中心,围绕高考来运作。不仅如此,高考还几乎成为评价教育结果的唯一尺度,追求好的考试成绩因此成为教育施行过程中的直接目标,我们现在常说的“片面追求升学率”即是这一目标的极端化。从文化上看,不仅高考制度的建立与恢复本身是对舍出身、血统、关系等不公而取能力、学识、自身等公平因素的一种文化选择,而且高考对社会的文化提升也作用巨大,全社会的读书学习热情在高考的促进下得以持续高涨。从政治上看,高考制度促使社会结构重新“洗牌”,影响着社会阶层的变迁,尤为重要,低阶层子女通过高考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从而得以疏散社会底层对资源分配机制所郁积的不满。再者,“文革”时期的“考试废,道德堕”,以及恢复高考所发挥的使社会实现“由乱而治”之功,说明高考还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此外,高考所带来的“考试经济”,以及通过对教育、政治、文化的直接作用来促进社会协调发展,说明它还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功能。^[6]

正是这种“身兼数职”,使高考成为广受注目与重视的高利害、高风险的教育考试与社会活动,并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无怪乎有人说,恢复高考无异于一场“抢才大典”,抢出了人才,更抢出了社会发展的时间。1977 年的冬天,既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也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拐点。^[7]亦无怪乎 1997 年 11 月《人民日报》在纪念恢复高考 20 周年征文的综述中说“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8]

高考因其稳定社会秩序之功而被政府高度重视,也因其影响社会阶层之流动与变迁而为百姓密切关注。每年自年初的高考工作会议召开,考生和家长们便开始留意高考改革的种种动向;高考前夕,但凡举行有关高考信息或高校招生的发布会或咨询会,家长和考生们亦唯恐错漏;高考三天,各大报章、电视媒体等,更是将视角聚焦于考场内外的方方面面,构成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高考之后,分数线和取录办法则成为万众瞩目、翘首以待的焦点,甚至落榜考生的命运,也会成为千百个家庭茶余饭后的谈资。到秋季入学前夕,贫困新生的入学和助学问题,虽属高等教育政策范畴,但依然能引发普通百姓对高考和社会公平等问题的新一轮反思。可见,社会大众对高考的关注有着经年不息的热情,这在教育领域是绝无仅有的。

不仅当今中国是一个考试社会,作为考试的发祥地,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极度重视考试的国度。早在公元 605 年,隋朝便创立了举世闻名的科举制度,到 1905 年废止,科举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 1300 年。在科举创立之前,中国历史上先后实行过“养士求贤”、“军功赏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选才制度,但这些办法要么对选拔对象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基本上是从统治阶级尤其是贵族子弟中推举才俊,即所谓的“‘血’而优则仕”,要么没有客观的举才标准,结果造成徇私舞弊和裙带之风盛行,人才素质低劣,如东汉末年即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之讽喻。而科举制度让中国的选材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科举的出发点是以考试的方法来选拔治理国家的各级人才,不仅把选拔对象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其轨道,而且“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有客观的选拔标准,“等第”面前人人平等,从而把“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理想加以制度化。

作为中国帝制时期的“抡才大典”,科举取士由于事关重大,且历时久远,其积极功能与消极影响都十分巨大,有如一把双刃剑,磨砺得越久越锋利。科举因此在漫长的历程中遭遇了各种议论,其中至少有六次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的影响较大的争论或改制。^[9]争论的结果是科举数次被废,但每次都旋废旋复。考试选人的办法之所以被发明,背后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请托困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先人们发明了考试这把客观公平的“量才尺”。受“重人情、关系、面子”的传统文化影响,在社会资源和教育机会的竞争过程中,如果不以考试成绩这一“后致因素”为竞争资本,金钱、权力等“先赋因素”则将取而代之。这已为中国考试历史所一再证明,且古今皆然。因之,古代科举与当

代高考都成为各自时代的“社会重心”与“矛盾聚焦”,备受时人所“青睐”。

再从我国的现实国情看,虽然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起飞,但毕竟“人多底子薄”的先天不足一时难以扭转,导致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严重不足,社会竞争较为激烈。而高考恰恰是高中毕业生面临的第一次强制性社会(脑体)大分工,高考的竞争也就是人们一生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浓缩”,三大差别(尤其是脑体差别)是导致高考竞争的根源。“只要存在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竞争就会存在。高考取消不了,高考的竞争也取消不了”。^[10]再者,根深蒂固于国人心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公”意识,也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高考刚性竞争近乎顽固的偏爱。

因此,在高等教育机会极为有限、社会竞争压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高考这根“魔力指挥棒”推动着“片追”愈演愈烈,应试教育也难以抑止。“片追”所追逐的实际上是稀缺社会资源,高考竞争或应试教育都只是社会竞争的一种表象或结果。当今教育领域的许多弊端从表面上看是高考造成的,但根源不在高考,甚至不在教育本身,高考只是使一些问题凸显出来;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和社会矛盾的集合点,因此备受争议。^[11]把高考说成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似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同样,素质教育之所以难以顺利推行,根源在于重视教育与学历、信奉读书至上的社会传统文化,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与其说是高考,毋宁说是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社会矛盾,应试教育和高考只不过是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这些关于高考的误读都是由社会竞争和社会矛盾所引起,是该为长期“替人受过”的高考“正名”的时候了。

然而,要克服因激烈的社会竞争浓缩到高考身上而带来的所谓“应试教育”等诸多弊端谈何容易,“替人受过”的高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摆脱不了本不该承受的苛责与不时被“妖魔化”的命运。如果不对高考的本质与功能作深入的探析与思考,那么,就像一只背负重壳的蜗牛一样,高考将被迫承载着远远超出

自身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责任而步履维艰,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健康发展,也丝毫无助于教育或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缺乏理性的“妖魔化”对高考这一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巨大的历史贡献、深刻的公平意蕴、相对科学可行的选材办法也是极不公正的。唯有对高考进行理性认识与客观评价,并适时适地、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然功能,还其以本真面目。须知,世上绝无能“包打天下”的制度,诚如清乾隆朝大学士鄂尔泰在针对同僚对八股制义的批评时所言:“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12]相对而言,高考在发挥社会功能、维护公平正义、兼顾科学高效等方面已是当今最好的一种选材办法。一言以蔽之,高考就是高考,永远也只是高考。

参考文献

- [1]李冀. 教育管理词典[M]. 第2版.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02.
- [2]王策三. 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7).
- [3]郑若玲. 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99-200.
- [4]郑若玲.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高考录取中的两难选择[J]. 高等教育研究,2001(6).
- [5]刘海峰,樊本富. 论西部地区的“高考移民”问题[J]. 教育研究,2004(10).
- [6]郑若玲. 高考的社会功能[J]. 现代大学教育,2007(3).
- [7]晓宇. “恢复高考30年”专栏评论[N]. 潇湘晨报,2007-04-06.
- [8]杨学为. 中国需要“科举学”[J]. 厦门大学学报,1999(4).
- [9]刘海峰. 科举制长期存在原因析论[J]. 厦门大学学报,1997(4).
- [10]杨学为. 高考改革与国情[J]. 求是,1999(5).
- [11]刘海峰. 高考竞争的本质与现象[J]. 高等教育研究,2006(12).
- [12]李调元. 淡墨录(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97.

(实习编辑:刘培,责任编辑:赵友良)

收稿日期:2008-12-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高考改革与入学机会公平研究”(编号:08JJD880246)。

作者简介:郑若玲,1970年生,女,江西修水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考试制度等研究。